

赴德特派记者访奥格斯堡大学教授苏斯 大屠杀历史：从掩盖到揭露

新民晚报记者 齐旭

“在人们的印象中,战后德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做得很好,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那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并不值得骄傲。”在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学系的迪特马尔·苏斯教授看来,战后德国关于二战的记忆与两个“大”分不开:一个是大轰炸,另一个则是大屠杀。

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极其客观的立场回顾了德国对二战记忆的转变。

大轰炸纪念备受争议

二战期间,英美军队对慕尼黑、德累斯顿等德国城市发起大规模空袭。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话题。

“轰炸带来的浩劫成了德国城市史的主流叙述。”苏斯教授以慕尼黑的瓦砾山为例指出,大轰炸的记忆往往与现实中的历史冲突相关。战后德国,清理轰炸废墟后形成的瓦砾山成为纪念死难者的场所,但对于如何为它们命名、相关修建是否正确呈现了德国的战争往事,往往引发争论。

“对大轰炸的记忆,从德国城市的角度是关于重生的叙述,从基督教的角度是强调幸存的叙事,从和平运动的角度是作为和平事业的隐喻。此外还有寻找安全的叙事、关于国际和解的叙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关于德国禁忌的叙事。”

苏斯说,2002 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



德国艺术家的全景画卷“德累斯顿 1945”,高 30 米,长 100 米,再现 1945 年德累斯顿大轰炸

里德里希的著作《火焰》将大轰炸纪念推向高潮,该书主旨在于唤醒“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记忆,同时控诉同盟国的“战争罪行”,因而备受争议。

不再讳言大屠杀历史

如今,犹太人大屠杀已不再是德国历史中的禁忌话题,但苏斯教授说,德国为此走

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

在战争结束后的前十年里,犹太人大屠杀始终没有成为公众话题。苏斯教授说,当时关于说什么有很多限制,“这些限制虽然出于对受害者的善意,但也导致了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掩盖,意味着对过去的遗忘”。

另一方面,德国人更愿意将自己视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自我受害化的历史叙事,为

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提供了遁词”。

苏斯教授告诉新民晚报记者,发生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骚乱,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德国人对犹太人发起绑架谋杀行动的谣言引发双方冲突。“一些德国人以这场骚乱来消解自己的反犹主义罪责,同时也消解他们对支持纳粹驱逐和排斥犹太人的责任。”

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德对大屠杀问题的集体抑制,1961 年以色列对纳粹德国高官、“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但苏斯教授认为,这一时期两德对大屠杀的讨论高度政治化,都是为冷战宣传发挥作用。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英美推动下,联邦德国新成立的近代史学科才开始致力于揭露大屠杀历史。

要思考谁发动了战争

苏斯教授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日本在受害者情结上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相似之处。“人们总认为自己是纳粹统治的受害者,是冷战的受害者,却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发动了战争。”苏斯教授说,当时德国总理和州政府谈论的也往往是德国人受了哪些苦,而不是德国人的战争罪行。

当有人提议建造达豪集中营纪念馆时,许多人也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不想留下与达豪有关的记忆,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与纳粹罪行有牵连”。最终,在有识之士坚持下,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建立起来了,并成为巴伐利亚州学生必须参观的历史遗址。

苏斯教授认为,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但毕竟结果是积极的。所以对于日本,他也表示乐观:“也许过一些日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改变他们对战争的记忆,出现类似当年德国发生的那些运动,开始认真地讨论日本的罪行。”

赴日特派记者访国际经济评论家石田护 反省广岛悲剧未能成主流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石田护一直记得 8 月 6 日这个日子。70 年前的这一天,一颗原子弹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命运,在那个叫做广岛的地方,他的亲友未能逃过死亡的厄运。每年这个时候,石田总是禁不住遐想那些鲜活生命的最后瞬间。

国民狂热情绪助推战争

广岛的悲剧大约是日本人对二战最深刻的记忆,带着浓浓的受害者色彩,但很少有人去追问投下原子弹背后的原因。石田在意的,正是这一因果链条上缺失的一环。

“作为日本引发的那场战争的最终篇章,广岛的悲剧为什么没能避免?”他同时注意到,亚洲各国对广岛悲剧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战争结束后,广岛开始向世界发布和平宣言,但周边国家的反应是复杂的。

1991 年,时任广岛市长的平冈敬让石田找到了问题的重要答案:广岛悲剧背后的问号与被淡忘的战争责任有关,那是作为加害国象征的另一个广岛。难道广岛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吗?平冈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懈怠,因此在 1991 年和平宣言里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谢罪。可惜,这一反省未成为日本社会主流。

究竟谁应该为那场侵略战争承担责任?石田发现,在日本答案是暧昧的。

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的狂热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战争的扩大,当时少年的他见证了这个过程。

“日本的体制容易产生由思想统治带来的集团狂热的俘虏。”他在一篇反思文章中写道,“日本不能再成为那样的囚徒,这正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

政治应对历史负有责任

在石田看来,日德对战争责任认识不同的背后,还有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在德法共同推进和解进程的冷战时期,中日则分处于苏美阵营。正如中国一些研究者指出的,



广岛民众放河灯纪念原子弹爆炸 70 周年

“日本之所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是因为冷战初期美国在占领政策中允许旧官僚体制复活”。

另一方面,在政治对历史的责任上,日本政治家的表现与德国也有所不同。“安倍首相曾说历史问题应交给历史学家。”石田说,“但国际社会要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安倍的历史观无疑是暧昧的,相比之下,历代德国领导人则都谈到了“政治对历史的责任”。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一

段话让石田印象深刻:“没有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则无法开拓未来的道路。不可以简单地用一些偶然事件和行为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它是包含着义务和责任的。”他认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这是日本应向德国学习的核心部分。

日本要体察受害国心情

在日本围绕历史认识争论的当下,石田认为,如何填补日中的历史认识鸿沟事关两国关系能否改善。作为传承战争记忆的主要手段,历史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日

中历史共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将成果活用?”他认为,进一步说,继续开展这样的共同研究也是必要的。

在解决互不信任问题上,石田觉得东亚可以向欧洲学习。虽然有人认为在目前的现实之下讨论东亚共同体有些“不现实”,但他认为,这恰恰有再次思考的价值。如今虽然不能期待东亚结成像欧盟那样的联盟,但“若以东亚共同体为共同愿景,将能够助力日中关系的改善与东亚和平的构筑”。

石田指出,在民间层面,日本如何构建对战争受害国的“共感”非常重要。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后,一位广岛友人描述灾难惨状时对他说道:“我们眼光所及之处,与二战时的广岛是一样的。”沉思之下,石田觉得,难道日本发动的战争给中国留下的不也是满目疮痍的破坏吗?并且,破坏规模应该是数十倍、数百倍。“日中友好的第一步,应该是日本国民对战争被害国中国国民的心情有所体察。”

通往和解之路也许并没有那么漫长。石田提及他的小学校友田村秀子,她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了母亲,后来长居美国,作为广岛和平大使向美国人讲述历史。在一次纽约集会中,田村为日本的加害者行为道歉,当时在场的一些中国年轻人主动拥抱了她。“田村表示,她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治愈’。”

石田说:“我认为,那也是日中和解的理想样板吧。”